

INDUSTRIAL DIVIS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OF HONGKONG AND MACAO

产业分工、区域合作

5

港澳经济转型

毛艳华 著

本书从新古典经济学、
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国际贸易
理论等多视角对改革开放三十年
来粤港澳区域合作与产业分工的
过程进行了详细刻画，较深入地
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小企业
出口网络、泛珠江三角洲产业
分工与香港的角色、香港与内地
CEPA的经济效应、香港与内地服
务贸易合作、香港经济结构
转型、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
以及新时期深化粤港产业合作
战略思路等问题，揭示了粤港澳
区域经济从功能合作向制度
整合过程中的产业分工模式、
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和港澳经济
转型动力……

INDUSTRIAL DIVISION,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ECONOMIC TRANSITION OF HONGKONG AND MACAO

产业分工、区域合作



港澳经济转型

毛艳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产业分工、区域合作与港澳经济转型/毛艳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 - 7 - 5004 - 9329 - 7

I. ①产… II. ②毛… III. ①产业经济学—研究—广东省、香港、澳门②地区经济—经济合作—研究—广东省、香港、澳门③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香港④地区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澳门 IV. ①F127.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0169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刘娟

封面设计 楊蕾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插 页 2

印 张 14.75 印 数 1 - 6000 册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导论 分工、集聚与一体化	1
第一章 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出口网络	9
第一节 企业网络理论与研究问题	9
第二节 中小企业出口网络的组织与发展	16
第三节 中小企业出口网络的竞争优势	29
第四节 东莞电子资讯相关产业的案例分析	33
第五节 简要结论	45
第二章 泛珠江三角洲产业分工与区域经济合作	48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48
第二节 分析思路和逻辑架构	52
第三节 分析模型	55
第四节 实证结果	62
第五节 香港的比较优势和角色评价	73
第六节 香港的地位与作用分析	78
第七节 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86
第三章 香港与内地 CEPA 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93
第一节 研究背影与问题提出	93
第二节 CEPA 的性质与内容	95
第三节 香港与内地进出口贸易的发展现状	99
第四节 CEPA 区内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101
第五节 CEPA 区内的贸易流量效应	107
第六节 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	113
第四章 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实证分析	116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16

第二节 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发展特点	119
第三节 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合作状况	127
第四节 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	129
第五节 促进两地服务贸易合作的政策建议	135
第五章 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研究	139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39
第二节 香港经济发展历程回顾	141
第三节 第一次经济转型：全球价值链与现代香港工业化	145
第四节 第二次经济转型：“前店后厂”与香港经济服务化	151
第五节 第三次经济转型：现实背景和方向定位	154
第六节 第三次经济转型面临的主要难题	160
第七节 第三次经济转型的内外部优势	166
第八节 政策取向与策略措施	174
第六章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研究	180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180
第二节 适度多元化的内涵	185
第三节 适度多元化的路径	191
第四节 政策建议与配套措施	196
第七章 深化粤港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路	203
第一节 关于粤港产业合作模式转变的问题	203
第二节 传统产业改造与粤港战略合作	206
第三节 粤港合作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208
第四节 粤港合作建设大珠江三角洲重化工业基地	211
第五节 推动粤港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紧密合作	214
第六节 结语	217
参考文献	219
后记	229

导论 分工、集聚与一体化

在《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从“密度”、“距离”和“分割”三个方面来审视世界经济地理的变迁特征，并将聚集效应、迁移、专业化和贸易等市场力量作为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主要驱动力。其中，密度是指每单位面积的经济总量，它反映了经济的集中程度，往往是经济越集中的地方，越富裕；距离是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由此落后地区应重新定义为相对于经济聚集区的偏远地区，这不单指空间距离，更重要的是由于基础设施落后和制度障碍造成的经济距离；分割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的限制因素，简而言之，就是阻碍经济一体化有形和无形的障碍。该研究报告的分析框架被认为是汇集了过去一代人在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方面的研究成就^①。

在经济学的文献中，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论证了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效应，并从商品交易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市场容量与劳动分工的互动关系，提出了“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这一著名的“斯密定理”^②。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关注了特定区域的集聚经济效应，归纳了聚集经济的“供应商聚集优势”、“特殊技能人力资源聚集”和“共同的产品市场和声誉”三个优势，认为企业之间的近距离能够为厂商带来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③。施蒂格勒（Stigler）认为“斯密定理”是关于厂商、产业功能理论和产业地理结构的核心，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斯密定理作了进一步的扩展。他构造了一个关于厂商功能的理论，并利用这个理论来解

①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②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释一些经济中重要的问题，如垂直一体化、经济的地理结构、厂商规模的决定，等等，正式将斯密定理应用到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当中。施蒂格勒认为，运输成本的下降是提高市场容量的一条主要途径，而区域化是提高产业经济规模，从而获得专业化利益的一种方式^①。从这一意义上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削弱了经济分割，使专业化和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

20世纪以来，经济地理学从区位的视角解释了产业聚集现象。韦伯（Weber, 1929）认为，交通和劳动力成本的差别决定了产业的空间分布，并将聚集因素分为区域因素（Regional factor）和聚集因素（Agglomeration）。韦伯深入地探讨了产业聚集的因素和聚集形成的规则^②。他把产业集聚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仅通过企业自身的扩大而产生集聚优势，这是初级阶段；第二阶段是各个企业通过相互联系的组织而产生工业化，这是最重要的高级集聚阶段。克鲁格曼（Krugman）在继承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和综合古典区位理论的基础上^③，提出了新经济地理的分析框架，他把特定区域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看作为产业水平上的行业规模经济，认为产业聚集是规模报酬递增带来的外部经济的产物，在分析方法上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 1977）的垄断竞争分析框架为基础，通过分析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建立了描述产业集聚的“中心—外围”模型，首次通过数学模型分析证明了工业集聚将导致制造业中心区的形成（Krugman, 1991）^④。另外，克鲁格曼在其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强调产业发展的自发性，强调历史偶然因素和地理位置优势对聚集经济的影响（Krugman, 1993）^⑤。

① [美] G. J. 施蒂格勒：《市场容量限制劳动分工》，载《产业组织和政府管制》，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② 韦伯：《工业区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③ 克鲁格曼将外部经济归纳为三种类型：市场规模扩大带来的中间投入品的规模效应、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和信息交换与技术扩散规模效应，并认为前两者在产业聚集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即集聚的规模效应以及生产要素与人口的自由流动，会促使经济活动趋于集中。（详见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Vol. 99, pp. 483–499.）

④ Ibid., pp. 483–499.

⑤ Krugman, P., 1993, “First Nature, Second Nature, and Metropolitan Location”,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3: 129–144.

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也遵循着同样的演进规律。古典分工理论认为，专业化分工协作及其效率的提高，是国际贸易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传统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最终产品的生产分工与贸易这一前提条件之上的。根据比较成本学说和要素禀赋学说，贸易双方在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方面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双方在生产相应的商品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这种优势通过贸易进行交换而得到实现，为双方带来收益。但是，无论是行业间的分工贸易还是行业内部的分工贸易，都是指最终产品的分工贸易。即某一产品的所有生产环节都在一国范围之内，不存在生产的跨境分离现象。按照这种理论框架，不同国家在一种产品的生产中具有相对优势，在另一种产品的生产中具有相对劣势，各自应该生产自己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提供出口，进口具有相对劣势的产品满足国内消费。因此，国际分工呈现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与农业、矿业之间的垂直分工格局。

新贸易理论则认为，交通成本的下降促进了专业化分工、市场扩大以及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强调大部分贸易代表的是基于收益递增的任意的分工，而不是为了利用资源和生产率等方面的外生的差异^①。在新国际分工体系中，比较成本与要素禀赋渗透到生产的不同环节上，国际分工不仅仅停留在不同产品之间或产业之间，而是进入产品制造工艺过程内部或产业内部。一个产品在它的加工链条中，在发达国家表现为利用资金技术渠道方面的优势，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利用劳动成本方面的优势，形成了以加工贸易为特征的国际分工模式，以及在生产工艺过程不同环节上国际分工的转移过程，即“雁行模式”的国际间产业转移现象^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通过生产链条或增值链条在国际间的调整，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的资源优势，将越来越多的产品通过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子公司在各个阶段或

① 对于新国际贸易理论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之间的差异，克鲁格曼认为：“在国际经济学中，自李嘉图到 20 世纪 80 年代，在解释贸易时，几乎只强调比较优势，而不强调收益递增。强调比较优势，表明国家之间进行贸易是为了利用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收益递增的方法，指国家之间之所以进行贸易，是因为即使对初始条件类似的国家来说，分工也存在着固有的优势。”（详见保罗·克鲁格曼《地理和贸易》，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日] 小岛清：《对外贸易论》，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各个部件上进行分工生产，产品从一个环节流向另一个环节^①。因此，跨国公司主导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和新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电子信息技术革命、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构建都极大地推动了市场的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和商品贸易在全球的自由流动。2000 年，全球贸易在生产中的比例超过了 25%，这几乎是 1900 年水平的 5 倍。同样，交通通信成本的降低不仅缩小了世界距离，而且也促进了人口和经济活动的进一步集中。先行工业化国家在 1880—1900 年期间的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大约每年为 300 万，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人口在 1985—2005 年每年增加 830 多万。2000 年，世界前 100 名大城市的平均规模是 1900 年规模的 10 倍，而且这些城市中有将近 2/3 分布在发展中国家。2000 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 1/4 集中在面积和喀麦隆相当的区域，1/2 集中在面积和阿尔及利亚相当的区域。1980 年，欧盟 15 国、北美洲和东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生产总值的 70%；2000 年，这一比例增至 83%^②。因此，人类居住区的日益密集化、人工移民和企业的集中缩短了市场距离，减少了国家间因货币和风俗差异而导致的分割，从而对全球经济的成功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这种沿着密度、距离和分割三个特征进行的空间转变在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表现得最为突出。自 1978 年中国内地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珠江三角洲与毗邻的港澳地区建立了产业分工联系，并且依靠香港这一国际贸易中心获得了进入全球市场的机会。近 30 年来，跨境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政府层面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措施极大地减少了香港与内地尤其是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在生产要素和商品贸易流动的障碍，大大地降低了与经济距离相关的时间成本、货币成本和心理成本。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实际吸收来自香港的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1429.6 亿美元；广东对香港的贸易总额由 1978 年的 6.35 亿美元增加到 2008 年的 1338.71 亿美元。珠江三角洲的本地生产总值由 1980 年的 119.19 亿元上升到 2008 年的 29745.58 亿

^① 例如，在美国计算机生产商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由中国大陆完成印刷电路板的制作，中国台湾地区生产机箱，而日本厂商供应集成电路芯片，美国的总部主要负责整机的设计、关键零部件制作、总装和调试等关键环节。

^② Fujita, Masahisa, ed. 2007,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Viewpoint of Spatial Economic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元；同样，香港的本地生产总值也由 1434.02 亿港元增加到 16751.71 亿港元。在这一过程中，分工与集聚效应使香港逐渐转型成为以服务业为主的国际服务中心，而珠江三角洲地区则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因此，专业化分工、集聚经济和区域一体化等市场力量推动了粤港两地经济的互动发展，成为该区域持续增长的主要动力。

基于以上理论演进和现实背景的分析，本书从新古典经济学、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国际贸易理论等多视角对改革开放 30 年来粤港澳产业分工、经贸投资与区域合作的历程进行了较深入的学术研究。全书共由七章内容组成，分别为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出口网络、泛珠江三角洲产业分工与区域经济合作、香港与内地 CEPA 经济效应的证实研究、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实证分析、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研究、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研究以及深化粤港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路。全书力图通过揭示粤港澳区域经济从功能合作向制度整合过程中的产业分工模式、区域经济合作的协调机制和港澳经济转型的动力，为 CEPA 框架下深化粤港澳紧密合作、推进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进一步增强该区域在新一轮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竞争力提供有价值的指导意见。

第一章“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出口网络”着重探讨对外开放和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地理变迁的微观结构与动力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加入全球分工体系成功地实现了出口导向工业化，由此推动了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广东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1978 年的 5.1% 快速上升到 2008 年的 11.9%。本章在对新国际分工背景下企业网络相关理论系统综述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出口网络的产生背景、形成条件、内部构造及其演化模式等问题，提出以华人资本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网络化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组织阶段：即以香港制造业产业组织“虚拟化”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下包网络和以台湾制造业产业转移或迁移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本章通过对东莞电子资讯相关产业发展模式的案例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中小企业出口网络与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持续的外商区位优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泛珠江三角洲产业分工与区域经济合作”着重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讨区域化如何促进产业分工和提高产业经济规模从而获得专

业化利益。泛珠江三角洲“9+2”区域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如何有效调动各方积极性，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实现有序分工与合作，是推动泛珠江三角洲协同发展的首要问题。本章应用要素禀赋理论、专业化分工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对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分工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对香港在泛珠江三角洲合作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章研究认为，生产要素互补性、专业化产业差异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性等优势是泛珠江三角洲产业分工合作的基础，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新产业分工理论，积极开展资源性产业、传统产业改造以及建设泛珠江三角洲“世界工厂”等领域的产业分工合作对于泛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调整和“中国制造”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泛珠江三角洲产业分工合作中，香港扮演着金融服务中心、信息与科技中心以及商贸与供应链管理中心的角色，并发挥着提升泛珠江三角洲内地省区的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提高服务业整体发展水平的重要作用。

第三章“香港与内地CEPA经济效应的证实研究”重点关注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与内地货物贸易发展产生的影响。为验证CEPA对内地与香港的经济效应，本章在对CEPA性质评述和CEPA实施前后香港与内地货物贸易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巴拉萨模型分析CEPA对香港和内地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创造效应，并引入引力模型实证研究CEPA实施以来对香港和内地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问题。本章提出为了顺应和推进内地和香港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联系和区域分工，需要加快区域经济整合的制度创新。在功能性整合创新方面，主要是从存量优势向增量优势转移。对内地来说，除了发挥市场广大、资源丰富的优势外，还要着重改善软环境；对香港来说，创造新优势的方向是服务业的高级化，向高层次发展，使服务业与时俱进。在制度性整合创新方面，要考虑建立和完善人力、财力、物力、信息在两地间便利流动的渠道，不断扩展和完善统一和有效市场的形成，以促使香港巩固其金融、贸易、航运、信息等国际中心的地位，将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与融合向着更宽领域和更高层次方向推进。

第四章“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的实证分析”着重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产生的影响。近年来，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合作已成为两地经贸关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本章通过翔实的数据资料和直观的图表解释，认为内地和香港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很强的互补

性，内地服务贸易主要集中在运输和旅游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部门和资源禀赋优势部门，总体发展水平不高，整体竞争力差，出口结构不合理。而香港的服务贸易优势在于金融、保险和专业服务等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部门，具有很高的开放度。在对香港与内地服务贸易的发展特点和合作现状深入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采用竞争力指数法对香港和内地的服务贸易竞争优势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香港与内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能够达到双赢的结果。本章最后提出加强两地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与交流、实现由“制定 CEPA”到“落实 CEPA”的转变、深化香港与内地在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遵循优势互补的原则加强两地在物流服务业的合作等四方面的政策建议以深化 CEPA 框架下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合作。

第五章“香港经济结构转型研究”重点关注新国际分工体系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香港经济转型的主要特征、动力机制和新时期转型的路向。自开埠以来的近 170 年间，香港经济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和三次经济转型。本章在对香港经济发展历程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了香港工业化时期的产业组织结构特征和香港经济服务化时期的“前店后厂”粤港产业分工模式，对香港经济先后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服务化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本章还重点分析了香港经济第三次结构转型的定位、方向、面临的难题以及结构转型的内外部环境，对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步伐困难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剖析。本章最后提出构建经济转型的和谐社会环境、培育产业多元化发展的环境、加快粤港两地经济的融合、加强政府与企业的战略合作四项措施与建议以配合香港新时期经济结构的转型。

第六章“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研究”着重探讨澳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关资源禀赋、市场容量与专业化产业选择的理论与现实问题。长期以来，澳门经济结构一直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化发展趋势和多元化发展要求的矛盾。本章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内涵进行了理论诠释，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多元化或专业化主要取决于其资源禀赋、市场容量和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一般来说，大国因其拥有较丰富的经济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会呈现出多元化的经济结构特征，各产业之间的结构比例关系相对合理；而相比之下，小国或小型经济体因自身市场狭小，自然资源相对有限，在参与国际分工的条件下往往会展现出较单一或专业化的经济结构。澳门是一个典型的微型经济体，资源十分有限，本地

市场狭小，没有条件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多元”。因此，澳门经济多元化只能是适度的。本章从澳门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产业结构单一化以及博彩业的特殊性等三个角度深入地研究了影响澳门经济不稳定性和波动性的主要原因，并从控制博彩业的适度规模、大力发展非博彩旅游业和适度发展其他新兴产业三个方面分析了实现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路径。本章最后提出了配合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的主要政策和措施。

第七章“深化粤港产业合作的战略思路”着重研究在区域一体化的制度创新安排下如何深化区域产业分工和加快专业化经济集聚，从而遵循经济地理三大特征促进港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地理变迁，不断提高区域经济和产业竞争力。本章首先提出了加快粤港产业合作模式转变这一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明显战略意义的课题。认为随着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实施（即CEPA），香港和内地的经济合作关系已进入到一个通过制度性安排去规范和推动经济整合的新阶段，这为粤港两地建立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提供了契机，粤港两地政府必须改变过去单纯基于比较利益的自由合作模式，加快建立具有明确产业和技术政策的长期经济合作战略关系，以继续发挥两地的经济优势以及经济合作的“合成效应”。然后，对新时期粤港两地在CEPA框架下开展产业战略合作的基本思路进行了详细探讨，提出粤港两地构建基于大珠江三角洲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传统产业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化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发展等领域的战略合作关系，以推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发展由传统的粗放式朝向依靠技术进步的技术集约化增长方式迈进。

第一章 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出口网络

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使珠江三角洲地区成功地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本章在对企业网络相关理论系统综述的基础上，详细研究了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出口网络的产生背景、形成条件、内部构造及其演化模式等问题，提出以华人资本为核心的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中小企业网络化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不同的组织阶段：即以中国香港制造业产业组织“虚拟化”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下包网络和以中国台湾制造业产业转移或迁移为特征的珠江三角洲中小企业集群网络。本章通过对东莞电子资讯相关产业发展模式的案例研究，深刻地揭示了中小企业出口网络与珠江三角洲外向型经济的竞争力、持续的外商区位优势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

第一节 企业网络理论与研究问题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企业网络这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成为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地理学等研究的重要课题^①。企业网络被认为是在市场以外以及在等级组织以外的新的组织形式，它比市场稳定，比

^① 作者认为，企业网络理论的兴起具有强烈的国际分工背景含义。弗罗贝尔（Frobel, 1978）在《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国际分工与此前旧的国际分工进行了比较，认为随着欠发达国家涌现出越来越多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关联的生产部门，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也由此发生了重大改变，从“贸易”转向了“生产”，即全球经济形成了贸易网络和生产网络相互交织的现象。与此相关的概念还有全球商品链（GCC）（Gerefifi, 1998）和全球价值链（GVC）（UNIO 2002）等。

等级组织灵活 (Thorelli, 1986; Powell, 1990; Jarillo, 1993)^①。白斯特 (Best, 1990) 以“新竞争”(New Competition) 体系描述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建立在网络以及企业之间纵向和水平联系基础上的小型企业家型企业的兴起、新兴产业 (emerging industries, 像计算机和生物技术) 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如硅谷及意大利的 Prato 和 Modena 的竞争优势以及一些亚洲区域经济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的竞争力提升与迅速崛起^②。其中, 亚洲“四小龙”经济通过自己建立和参与国际化企业网络组织, 直接进入核心产品加工经营的国际劳动分工链条, 在一些新兴产业的价值链中成功地占据了重要的角色。因此, 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 企业网络结构的形成与发展为发展中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③。

产业组织学者在对“第三意大利”生产模式研究和对德国南部经济发展经验分析的基础上, 提出柔性专业化理论, 认为在以“技术与组织变化”为特征的后福特资本主义时代, 中小企业网络所具有的弹性专业化分工优势比福特制的大批量生产体制更有竞争力 (Piore and Sabel, 1984)^④。技术创新学者则强调中小企业网络中企业之间的相互信赖、联系与合作关系, 以及网络成员之间的互动学习、信息与知识交流是企业竞争取胜的源泉, 提出了“创新环境” (milieu) 或“创新网络”的概念 (Camagni, 1991)^⑤。经济社会学分析当地经济关系的嵌入性 (根植性)

^① Thorelli, H. B., Networks: between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6, (7); pp. 37–51; Powell, W., Neither Markets nor Hierarchies: Network Forms of Organization, *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1990; Jarillo, J. C., On Strategic Networks, Creating the Borderless Organiz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88, (9); pp. 31–34.

^② Best, M. H., *The New Competition, Institutions of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③ 弗朗西斯 (Francis, 2004) 在《全球化与“更新的”国际分工》一文中, 描述了比弗罗贝尔 (Frobel, 1978, 1980) 的“新”国际分工“更新”的国际分工。他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资源禀赋的动态发展,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中呈现出伯曼和麦金 (Berman and Machin, 2000) 意义上的“技术提升”(skillupgrading) 现象。弗朗西斯还从商品出口、服务出口、货币流动、人力资源流动的角度考察得出, 在“更新”的国际分工中, “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中国、印度、土耳其将成为“更新”的国际分工中的关键角色。

^④ Piore, M. and Sabel, C. F.,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⑤ Camagni, R. (eds.) *Innovative Networks: Spatial Perspectives*, London: Belhaven, 1991.

与社会资本的作用 (Pyke and Sengenberger, 1992)^①。经济地理学从生产网络角度关注大公司与产业区的相互作用，分析工业区与地理接近在企业网络化中的作用 (Grabher, 1993)^②，并使用递增报酬概念来分析经济活动的地理集中 (Krugman, 1991)^③。

在实证研究方面，美国学者安纳利·萨克森宁 (Saxenian, 1998) 对硅谷和 MIT - 128 公路地区发展的比较绩效差异研究时，提出了建立在企业网络基础上的地区优势与持续竞争力以及本地根植的合作性竞争对 IT 产业升级的重要性^④。徐进钰 (1999) 在研究台北——新竹高科技走廊时指出企业的学习网络在全球化具有区域竞争优势，并认为政府干预、公共机构的根植和网络化的生产系统对于当时作为发展中地区的中国台湾的高技术产业获得全球竞争优势起到关键性作用^⑤。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上揭示了企业网络作为有别于大企业和单个中小企业的独特产业组织形式本身所固有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即企业网络的竞争源泉来自网络组织的内部构造。近年来，发展经济学家分析中小企业网络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作用，如对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墨西哥、巴西、秘鲁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中小企业产业组织的研究，基本证实了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比分散的中小企业具有更强的竞争优势，并能极大地增强地方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Dijk and Rabellotti, 1997; Porter, 2000)^⑥。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就如何发挥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经

① Pyke, F. and Sengenberger, W., *Industrial Districts and Local Economic Regener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Labor Studies, 1992.

② Grabher, G., *The Embedded Firm – On the Socioeconomics of Industrial Networks*, London: Routledge, 1993.

③ Krugman,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99), No. 3.

④ [美] 萨克森宁：《地区优势：硅谷和 128 公路地区的文化与竞争》。曹蓬、杨宇光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9 年版。

⑤ 徐进钰：《迈向一个学习性的区域？台北——新竹高科技走廊的厂商聚集与技术学习》，博士后论文，台湾师范大学，1999 年。

⑥ Dijk, M. P. Van and Rabellotti, R., *Enterprise Clusters and Network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Frank Cass & Co. LTD. 1997; Porter, M. E., *Location, Competi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cal Cluster in a Global Economy*,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000, 14 (1): 15–34.

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了许多建议与对策 (OECD, 1996; Theo and Pimden, 1998; UNCTAD, 1998)^①。

企业网络是在以国际劳动分工和全球商品链为特征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产业组织形式 (Gereffi and Koreniewicz, 1994; Schmitz and Nadvi, 1998)^②。企业网络形成的主要推动力是资产联系、产业关联、专业化分工和交易成本等。企业网络的组织结构及其发展特征在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地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认为，企业之间的协作网络有三种形式：(1) “王国型” 协作网络。如日本的“下包”型生产组织方式，形成以大企业为核心的供应商层级关系网络，主要存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企业制度的“下请分业构造”使日本的制造业获得了长期的竞争优势，其实质也是以大企业集团为核心的中小企业专业化网络 (青木昌彦等, 1999)^③。(2) “共和国” 型协作网络。即为平等互利的合作，存在于专业化程度很高的企业之间。如“第三意大利”的中小企业网络，中小企业之间形成的专业化协作网络已成为提高产业整体竞争力、减少市场风险、降低生产成本和企业之间相互学习的有效形式，并能带来经营管理和创新上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应 (Pedersen, et al., 1994)^④。(3) 柔性专业协作网络。主要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以亚洲国家为代表。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地区的华人经济中小企业出口网络。

事实上，大量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以 OEM 方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的下包生产地，在跨国公司通过国际下包网络在全球获得“寡占”市场地位的同时，这些国家或地区也以靠灵活的中小企业出口网络成功地走上了工业

^① OECD, Networks of Enterprises and Local Development: Competing and Cooperating in Local Productive Systems, 1996; Theo, I. A., Roelandt and Pimden Hertog, Cluster Analysis and Cluster-based Policy in OECD Countries, Paris: OECD, 1998; UNCTAD, Promoting and Sustaining SEMs Clusters and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1998.

^② Gereffi, Gary and Miguel Koreniewicz (edited),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4; Schmitz, Hubert and Nadvi, Khalid, Clustering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troduction, World Development, 1998, pp. 1503 – 1513.

^③ 青木昌彦等:《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9 年版。

^④ Pedersen, P. O., Sverrisson, A. and Dijk, M. P. Van,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 the Dynamics of Small Scal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1994.